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8 期（民國 86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sup>1</sup>。岸本美緒著。東京：研文出版（山本書店出版部），1997年1月。540頁+16頁。

## 一、研究的課題與架構

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所呈現的特質究竟是什麼？一直以來是史學界所關心的課題。六十年代後期日本史學界受到「封建社會停滯論」或「社會發展階段論」的影響，研究的重點集中於階級的生產關係、市場經濟的性格、以及社會發展的面相等分析上，雖然累積了若干的研究成果，但受到理論模式的制約，使研究顯得片面而偏頗。無論停滯論所描述的傳統中國是緩慢靜止的，抑或是階段論所勾勒出的社會是直線的前進模式，終究未能完整地掌握出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面貌。

隨著近年來學者的努力與省思，對明清社會經濟的研究逐漸開拓出嶄新的方向。包括經濟變動的趨勢、價格結構的分析、市場機能的論述、以及社會與經濟的關聯等課題，皆有豐盛的收穫（見第一篇岸本對物價史的綜合評介）。本書作者即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並進一步加以補充與修正，期以對明清經濟作更深入的了解。

全書第一篇主要對有關清代物價史、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作一綜合的回顧與整理，並提出個人所關心的課題；第二篇以數據資料為基礎，分析明清時期經濟發展長期與周期變動的趨勢；第三篇對應著各個不同的經濟局面，論述該時期的經濟面相、經濟活動、以及當時的經濟思想；第四篇以個別事件與人物等史料為軸心，進一步分析不同經濟環境下所反映出的經濟觀念與問

<sup>1</sup> 感謝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第 17 次「經濟史研究討論會」中提供宣讀本文機會，並承蒙與會學者、先進惠賜意見，並在會後獲岸本教授來函，對本稿疏漏之處提供修正意見。謹此深表謝意。

題；第五篇作為附錄，介紹有關經濟史料的論著。全書章節如下：

第一篇

第一章 清代物價史研究の現狀(1987)

補論 1 近十年來の清代物價史研究

第二章 モラウ・エコノミ——論と中國社會研究(1990)

第二篇

第三章 清代前期江南の米價動向(1978)

第四章 清代前期江南の物價動向(1979)

第五章 清代前期の國際貿易と經濟變動

第三篇

第六章 明末の田土市場に關する一考察(1990)

第七章 康熙年間の穀賤について——清初經濟思想一側面(1982)

第八章 清朝中期經濟政策の基調——一七四〇年代食糧問題を中心  
に(1987)

第九章 清代の「七折錢」慣行について(1987)

補論 2 清代の不動產賣買における貨幣使用

第四篇

第十章 「恒產瑣言」について(1976)

補論 3 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土地集積の新動向——「城居地  
主」問題

第十一章 「租覈」の土地所有論(1986)

第十二章 「租覈」市場論の經濟思想史的位置(1982)

補論 4 明末清初の農本思想

第五篇

第十三章 清代戶部銀庫黃冊について(1995)

第十四章 清末江蘇省太湖廳の晴雨糧價報告について(1994)

第十五章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河南錢糧冊」について (1992)

作者在第一篇中，綜合評介過去有關中、日與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有

關長期趨勢討論方面，指出目前研究應加強市場的分析，文中提及王業鍵利用各地都市穀價資料的關聯性來論述清代「全國性市場」的形成，但所謂市場的關聯性，究竟是聯結主要都市之間「點與線」的聯繫，抑或區域內統一市場已形成？由此顯示出市場的型態與規模仍需深入探索（第一章，頁 34）。至於全漢昇與 Richard A. Kraus 合著的《清中葉米糧市場與貿易》一書，以數據資料論證市場的發展上有突破性的看法，但與文字資料間的互證仍需加強，同時有關市場機能、國家政策、以及長距離貿易對米價變動造成什麼影響也需更具體的分析（第一章，頁 34）。

至於長期與周期性變動的研究方面，岸本認為 Evelyn Rawski 的研究，不應只注意明清時期農業自十六至二十世紀間長期成長的過程，當中數次經濟衰退的周期性波動局面也應予以重視（第一章，頁 24）。同樣的缺失在戰後日本史學界對明清社會發展的描述，如土地累積、商品經濟、農村手工業發展等討論，以直線式的思考模式也是值得商榷（第一章，頁 35）。

上述有關市場與經濟波動的討論中，作者指出明清時期處於起伏不定的環境下，當時人們是採取何種手段來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清代市場逐漸整合的過程，清代時人面對這樣的變化又產生什麼觀念？相較於西方學者投注精神於若干大區域經濟圈的分析以論述全國市場統合的過程，近十年來日本學界較注意於全國經濟與地方經濟抗衡關係的研究。研究指出，全國市場的擴張造成當時地方人士產生白銀與食糧往區域外流的憂慮與危機感，逐漸形成一種地方性的防衛主張。岸本認為，國家經濟與地方市場的關係是值得注意，但日本學界的研究多偏重於文字史料的引述，量化的分析則尚需加強（第一章，頁 57）。

在物價的研究方面，學者引用費雪貨幣理論分析各種因素對物價的影響，多注意貨幣流通量(M)、交易量(T)、流通速度(V)與物價(P)的關聯性，但究竟物價的變動如何反過來影響前三者？而前三者之間又如何相互影響？以至物價與物價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即所謂「相對價格」的討論，仍是清代物價史研究中尚待努力的方向（第一章，頁 26-27）。

此外，有關傳統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型態討論上，一方面呈現

出小農經濟低度發展，不考慮成本的自給自足經濟型態；另方面又呈現高度市場商品化取向的態度。究竟如何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部份深受 J. C. Scott 對東南亞地區小農經濟型態研究影響的日本學者，認為小農經濟以「維持生存」、「慎重選擇」、「安全第一」、「不講求利潤的極大化，只追求危險的最小化」，是傳統中國小農倫理經濟的特色（第二章，頁 77），在村落共同體中的小農為了回避危險，往往依附地方上有力的血緣或地緣集團上，形成傳統中國小農經濟「封建的」、「隸屬的」階級結構，而地方主義的性格產生對外界防衛與競爭的對立觀念。至於小農「自給經濟」與「商品化取向」的矛盾現象，則認為是從封建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留下的殘餘現象。岸本即指出，日本史學界對傳統中國小農經濟型態的解釋過於片面與簡單化，傳統小農觀念中自給經濟與市場取向並存，無疑是對商品經濟變動中，經過計算得失後所作出的理性選擇，而對外界的防衛心態，同樣是對經濟發展下帶來的不安定性產生所產生的危機觀念（第二章，頁 85）。綜合上述作者所注意的研究課題，茲把全書分為六個部份加以介紹。

## 二、內容介紹

### （一）物價周期性變化的趨勢

本部份作者以江南地區史料為基礎，整理有關晚明至清末有關米價、生絲、棉布、田價、工資與茶價等物價的變化趨勢。由於討論散見各章，茲整理成表一以便了解。

米價變動方面，萬曆末年漸貴，崇禎十一、二年(1638、39)至明清交替期急騰；順治初年仍維持著高水平，而波動則較晚明輕，文中引述清初士人張履祥所見，社會上無餓死或賣妻鬻子者，顯然米貴與凶年歉收無關；順治後期至康熙前期因海禁與政府緊縮財政措施，造成通貨不足而米價下跌；康熙十九年米價漸升，明顯的回升要到三十年代後期；雍正年間又較康熙後期稍長；乾隆年間因人口增加形成米糧不足，造成米價騰貴；同治中期至光緒初年，上海米價下跌，主要是太平天國動亂平定後的回跌現象，至 1880 年代

仍持續低水平；光緒末年至宣統年間，米價再度騰貴，岸本認為與米糧歉收無關，而是因清末濫發銅元引起物價高漲的結果。

表一 明清間物價變動趨勢表

時 間	米 價	棉 花	生 絲	棉 布	田 價	工 資	茶 價
明代中期以來	低水平				下跌		
萬曆年間	上升		上升		回升	上升	
崇禎年間	急騰	騰貴	高水平		高水平	上升	
明清交替期	騰貴	暴跌		低落			
順治前期	高水平	高水平	上升	騰貴	急騰		
順治後期～康熙前期	低落	下跌	低落	低落	低落		
康熙18～20年間	漸升	低水平	回升		19年回升 20年下跌		
康熙後期～雍正年間	上升		上升		低水平		
乾隆年間	騰貴	漸升	騰貴	上升	騰貴	上升	
同治中、後期～光緒前期 (1860年代中期～70年代)	低落	低落					上升
光緒前、中期 (1870年代～1880年代)	低水平	低水平	低落				低落
光緒末年～宣統年間	騰貴						

棉花價格方面，崇禎初年上海棉花價格騰貴，明清交替期暴跌，順治元年仍低落，往後的發展則與米價相同。然而相較於江南，北方棉花市價一直低落，原因是明末北方動亂較南方嚴重，順治初年南方棉花生產亦較北方回復迅速，市場需求也較北方大，及至北方棉花生產復甦，卻在康熙初年的經濟蕭條而出現生產過剩，因此北方棉花價格上升要等到清代中葉。同光年間棉花價格隨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而由原來市道景氣而回跌，但岸本強調此時棉花價格下跌與外國棉製品或外國棉花輸入無關，因為與國內棉花價格下跌同時，也是棉花輸入的停滯期，而印度棉花雖然在清末輸入遽增，但是在1880年代棉花止跌以後的事。

田價方面，明代中期賦役繁重引致江南田價下跌；萬曆年間實施一條鞭

法使田價回升；崇禎時期維持高水平；順治初年米價騰貴，種田獲利，人爭買田使田價急騰；順治後期至康熙初年由於經濟蕭條與賦役負擔，人相率棄田使田價低落，即使康熙推行「均田均役法」也無法推升田價；康熙十九年因米價回升使田價亦一度復甦，但次年又告下跌；雍正年間仍維持低水平；乾隆年間隨著米價騰貴，政府屢蠲欠糧，田價才大幅騰貴。文中曾引用趙岡、陳鍾毅、劉和惠、張愛琴等人的數據資料與文字史料加以比對，發現十六世紀初期至後期，以及十七世紀初期以後兩個階段的趨勢大致相同，惟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此一階段，卻呈現數據資料顯示田價下跌，文字史料則是回升的分歧現象。岸本認為，由於十六世紀後期的賦役改革重點在解決負擔不均，並非在於減輕賦役負擔，因此買田獲利有限而使田價止跌，而田價即使上升增幅也不大。

棉布與江南生絲方面，順治以後的變動與米價相似，而生絲在康熙前期雖下跌，但未見時人感慨絲市利益微薄，岸本認為是由於江南生絲品質為他省無法取代有關。至於同光年間生絲市價下跌，是與當時生絲最大的消費國法國里昂生絲市價變動趨勢一致，顯示當時中國受到世界市場絲價波動的影響。

同光年間的茶價在 1860 年代前半上升，至 1870 年代中期開始下滑，往後進入長期低水平的局面，此現象同樣受到海外市況的衝擊所致。1860 年代印度錫蘭茶的栽培，1870 至 80 年代逐漸奪取中國在世界市場的地位，造成中國茶市一蹶不振。工資方面由於史料不足，難作長期觀察，雖然整體上工資有所增加，但物價長期上漲的趨勢，實質所得仍是下跌。以上綜合岸本有關明清物價變動趨勢的討論，以下進一步介紹各物價相互關聯的論述。

## （二）影響各物價變動的因素

### 1. 相對物價變動的關聯性

影響物價變動的因素，除外在條件影響物價本身，物與物之間價格變動也造成相互影響。因此在物價史研究中，「相對價格」的分析更為重要。而各種物價之間尤以關切民生所需的米價變動波及最為廣泛。首先就米價與田價的關聯性言，例如順治初年或乾隆年間米價騰貴，種田利多而使田價隨之

攀升，相對地，康熙初年因米價低靡而田價必減。但米價與田價的正相關，在饑饉的情況下則顯示出負相關的關聯性，凶年歉收米貴而田價卻下跌，如嘉慶進士周天爵所言：「饑年田畝必賤，民以田易命，安問貴賤。」

至於米價與棉花價格的關係，米貴使農民收入增加，帶動棉花市場的景氣而價格上漲。但順治元年的戰亂、以及康熙十八年山東、河南、江北稻作歉收而米貴，但棉花價格卻呈現相反的方向。前者因戰亂造成客商活動停止，米糧輸入減少而價貴，棉花因滯銷而價跌；後者也因歉收地區對棉花需求減少而造成滯銷價跌的局面。整體上，米價的漲跌對其他物價的影響，主要在於是是否能創造社會的「有效需求」，進而帶動市場的景氣，岸本特別提到物價間關聯性的時差現象。大致上米價往往較其他物價變動較早，由於米貴首先造成市場對其他商品有效需求減少，導致其他物價下跌或上升，但因米貴使地主或一般小農階層貨幣收入增加，隨之帶動對市場商品需求上升，結果其他物價也直追米價而上漲。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時差短則一至二年，長或至三至四年（頁 167），而岸本認為乾隆年間的情況較特殊，米價在乾隆初年至二十年急騰，生絲價格則是二十年代才開始直追米價，由於時差較一般長而尚待更進一步分析。

其他物價之間的關係方面，棉花是棉布的原料，因此棉布生產與流通的暢旺左右棉花價格，這是就長期變化而言，從短期來看，棉花與棉布的關聯性也有差異。如歉收影響各種物價變動，糧食因需求固定而上漲，而由於棉布作為工業製品，即使棉花歉收價貴，棉布仍然出現跌價的情況，其原因是：

(1)一般家庭糧食支出佔收入比例大，糧貴的結果將造成對其他商品支出的減少；(2)對棉布生產者而言，凶年時不得不拋售棉布以換取維生所需的糧食，結果造成市場棉布供過於求，最後是米與棉花俱貴而棉布價格下跌的現象。

## 2. 貨幣供需變化的影響

明清間白銀的流通左右中國經濟的變化已是不爭的事實。作者估算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中國與國外貿易的起伏變化，來了解與當時國內物價變動的關係。綜合數個世紀之間的海外貿易變化，岸本將之分為：(1)十六世紀末至 1630 年代，稱為「活絡期」；(2)1640 年代至 1680 年代前半，為「縮少期」；

(3)1680 年代後半至 1750 年前後，為「漸增期」；(4)1750 年至十八世紀末，為「急增期」。

第一期隨著海外白銀的流入帶動中國經濟景氣的來臨，但物價上漲的幅度不大。而晚明政府經由賦稅政策徵收民間白銀投入北邊的軍事地區，雖然白銀最後將回流至內地，但多集中於都市的富豪商人或大官僚手中，形成都市繁榮而農村貧困的懸殊局面。白銀集中於富豪勢家，逐漸締造富可敵國的地方勢力，北邊如李成梁、毛文龍，南邊如鄭芝龍的半獨立勢力，最終造成對中央的離心而瓦解明朝的統治。

第二期由於對外貿易的萎縮，使都市與農村皆呈現蕭條的景象，半獨立的地方勢力在此時逐漸剷除，而海禁政策形成物價低落、經濟蕭條，更見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關係。

第三期雖然海禁解除，但對外貿易仍未完全恢復，加上出洋商船多不歸國，東南海盜猖獗，清政府在 1717 年再度實施第二次海禁，但整體上物價下跌幅度不如前次嚴重，而當時日本與越南不在禁令之內，而歐洲商船來華也使白銀危機得以緩和，所以此時期物價相對而言較為穩定，經濟發展既無過熱，也未見深刻的危機。

第四期約自 1750 年前後，隨著外貿的日趨暢旺，農村經濟展現出景氣的面貌。岸本對林滿紅〈世界經濟與近代中國農業——清人汪輝祖一段乾隆糧價記述之解析〉一文提出若干疑問（頁 187-189），認為：林文引用彭信威據 H. B. Morse 有關東印度公司紀錄的 1740-1750 年白銀流入減少數據，是值得商榷。據 Louis Dermigny 的研究，1740-1750 來粵洋船增加，因此白銀流入減少的數據主要是 H. B. Morse 資料缺漏所致，又據 E. H. Pritchard 指出，1741-1757 年間西方政治相對安定，儘管中國貿易制度有缺失，但交易仍急速增加。另據黃印(1752)、蘇昌(1752)、蔡顯(1755-1761)等人提到物價資料（頁 200-202），顯示 1750 年代不止米價，其他物價均亦上漲，因此認為林文中所述 1775 年以前「專貴在米」的物價趨勢亦有商榷餘地。此外，岸本指出，若汪輝祖描述 1775 年代以前浙江存在不景氣的情況，何以當時田價反有上漲的趨勢。

### (三) 市場論

從清初海禁對中國經濟所造成的打擊，與十八世紀對外貿易順暢帶來經濟繁榮的情形來看，顯示貿易在清朝的市場經濟地位上相當重要，並構成清代市場一個特殊性格。

岸本以「蓄水池」來比喻清代的市場性格，蓄水池水源來自海外貿易，經由東南沿海流入，透過各地區之間蓄水池群的聯繫，使水源得以滋潤全國經濟，政府經由租稅手段汲取各水池的水份，再經由其他財政手段使水源回流，以促進全國水的流通。如此一個市場體系，岸本稱之為「地域連結型」的市場，它既異於具有統整全國大蓄水池的「統一國民經濟型」市場體系，又別於蓄水池相互孤立的「地域隔絕型」市場模式。「地域連結型」的市場體系，一方面既無法建立一個全國性規模，而編成一整體的分工系統，另方面由於未能達至地域本身完整的市場結構，故不能斷絕與其他地域的交流，否則難以自存。對於具有如此市場型態的國家或社會而言，水源的確保既重要，同時也有不確定性，水源停止供水或外流將造成水荒，如康熙初年與道光年間的銀荒即是，或因國內蓄水池間聯繫中斷，國家遂失去調節的功能而形成水源分配不均，如晚明的社會危機即是。由此觀之，清代市場特質相當倚賴與外部的聯繫，同時此一特質卻又構成中國經濟的潛在危機。

此外，市場的不安定性格不僅由於市場型態所造成，構成市場經濟中的成員，即小農經濟型態也是重要因素。傳統中國的小農以自給自足經濟為主，農業商品化的目的並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是以維持家計的安全性考量。經濟蕭條或物價低落時，農民並不是減少生產，反而是增加生產以為因應，與此同時，經濟蕭條不是擴大需求，反而是緊縮開支，結果造成市場供過於求，商品滯銷的局面，帶來有效需求萎縮的惡性循環。上述小農的經濟性格遂制約市場的發展，結果不得不依賴政府的財政政策，以及國外市場需要的擴張，形成市場性格中不安定的特質。

由於清代市場的不穩定性，以及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因此人民對物資(包括貨幣或食糧)流通動向相當敏感，遂產生內部市場自我防衛的心態，一面既期待外部市場帶來充裕物資，另一面卻不願內部市場對外的過度開放，因而

糧荒時有遏糶，銀荒時主張廢銀用錢，以保護地域性市場的安全。如此的市場體系，產生內部市場與外部市場之間，既倚賴又對立的矛盾緊張關係。

#### （四）地主經營論

書中分別舉出清代前、後期兩位地主所留下的文集史料為基礎，藉以探索清代地主的經濟理念。一位是出身於順康年間安徽桐城縣的張英，留下《恒產瑣言》一書；另一位是出身於清末蘇州的地主陶煦，留下《租覈》一書。

康熙初年經濟蕭條、米價暴跌，田土收益幾無利可言，但張英以個人切身的經驗，撰寫《恒產瑣言》勸戒子孫以田為業才是經久持家之道。基本上，影響田土收益減少的因素有：(1)水利荒廢致使田土收穫量少；(2)佃農抗租使實際收入下降；(3)米價下跌；(4)賦稅負擔增加。張英對田土收益的關心，並不注意抗租或賦稅因素，而是收穫量與米價的問題。岸本認為之所以如此，或許因安徽田賦較輕，佃農抗租不普遍有關。據張英的觀察，康熙初年賣田風潮盛行是由穀價過低，而田土收穫量少是城居地主對田地經營漠不關心。康熙初年的蕭條，對城居地主所造成的打擊甚重，相對鄉居地主則較為緩和。張英相當感慨城居地主在田土收益既微，根本無法彌補城居的消費支出，最後賣田經商多因經濟不景而破產。因此張英主張地主應生活儉約、盡地利、貫徹鄉居生活、逐漸累積財富以低價購置田產，以克服凶年，乃是最安全的持家之道。從中反映張英自給自足、自我防衛、維持生計的務本理念。岸本認為，儘管明清時期田土所有的長期趨勢，是從鄉居地主往城居地主手上集中，但以張英為例，在這個趨勢中也非直線式的發展，而是隨著外在客觀的經濟環境而有所起伏。

與張英相距近百餘年，而陶煦的時代同樣也處於米價暴跌，經濟蕭條的環境之中。陶煦認為，經濟蕭條的環境之下，地主應與佃戶共同體察時艱，相互分擔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生活問題。《租覈》一書中強列譴責地主對佃農的壓榨暴斂，因此提出他個人兩個主張：(1)「土田固君之所有」；(2)「佃者與紳富共有其田」。前者屬於田土王有論的觀念，後者是江蘇一田兩主制的環境下，佃戶擁有田面，地主擁有田底彼此共生、同質，以及平等的特色。上述主張的共同目的，是藉以抑制地主橫徵暴斂的行為。岸本指出，田土王

有論雖然並不是陶煦個人的新創，也非主張君主能隨意奪取人民手中的田產，其實背後隱含著對地主恣意專橫的制約，目的主要維護佃農的經濟生活，朝向一個更安寧的社會狀態，地主與佃農既然具有平等同質的地位，因此地主應減租以紓解佃農經濟壓力，面對著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地主減租將帶來佃農所得增加，並提升社會的有效需求。陶煦維護佃農與減租的理念，根本企圖是利用廣大的農民階層以振興消費市場，作為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對策。

### （五）消費論

所謂消費，是指市場購買力的問題。在傳統中國經濟思想上，消費在社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為古代學者所論述。清代初年以及晚清時期，面臨經濟不景氣的局面下，知識份子即對市場消費力的振興表示關切。

康熙初年許多士人在解決經濟蕭條的對策中，魏世儼的〈奢客說〉頗值得注意。岸著中以一個獨立的標題——「反退藏論」，以描述其消費的主張以提升社會有效需求的觀念。魏氏主張，是企圖把囤積於富戶的白銀，藉由消費回流於市場內，俾有益於廣大小民階層。由於富民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康熙初年的經世學者，如唐甄、魏際瑞、黃中堅等人皆重視富民，且肯定他們的社會貢獻，因而提出官方敲詐富民不當之「富室擁護」論調。但作者認為，此時學者消費觀念的特色，只認同富民的消費能力，並未強調小民也該有同樣的功能，僅屬於一種由富戶往小民的單向關係，換言之，並不存在富民、小民之間相互的、恒久的循環流通過程。

然而上述經世學者的消費主張，在清末同光年間的另一次危機，卻展現不同的面貌。陶煦在〈培本篇〉中主張地主減輕佃農的租金，即隱含著提升廣大農民層的消費能力。一反清初僅注重富民的消費價值。陶煦指出，千百農家可供消費的物資被一家所收奪，若只仰賴一家消費使千百民眾得沾餘潤，不僅道義上不能接受，即使經濟立場上言也不合理。富戶日用所出、生活所需、社交應酬，不過只佔其全部收入的小部份，消費支出對整體民生實屬有限。相對而言，物資散於廣大農民階層，個別的日用支出或許微不足道，但整體觀之，將對全體社會民生創造更大的有效需求。因此陶煦的消費觀念，是把消費主體從依賴富民轉向廣大的農民層，形成一種「大眾消費論」的主

張。透過農民的消費手段，自農村而市集、自市集而都市，經由購買力的連鎖關係，以振興經濟。

### （六）國家的角色

由於清代市場體系，內部市場與外部市場之間，存在著既倚賴又對立的雙重性格，這種市場的不安定特質，在經濟危機的時代裡越益明顯。因此，如何解決與紓緩地方市場的矛盾衝突？如何保護地方市場的經濟基礎？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如何？岸著中指出，以往對清朝政府立場的研究，認為其偏袒地主的階級論調是值得商榷，同樣，過度強調傳統政府重農抑商的手段也是把其經濟政策過度簡化。

近年來明清史學界熱烈討論的國家與社會、傳統政府經濟政策是統制抑或放任等課題。岸本以乾隆初年的食糧危機為例，指出清朝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擺蕩於「統制」與「放任」之間，政策實施的背後，實隱藏著以全國整體普遍利益原則為考量，如乾隆初年頻繁的糧食暴動中，政府一方面顧慮強制地主開倉或減租，將促使民間搶米或抗租事件的發生，因此僅對地主、商民採用「勸諭」的柔性手段使之開倉糶糧，同樣在糧食流通的政策上，對採取遏糶手段的地方官加以申斥與禁止，並通過減免米豆的關稅政策來鼓勵糧食流通，上述放任與不干預的財政政策，主要目地是加強餘糧區與缺糧區之間順暢的糧食流通，相對於這種放任政策，清政府對地方貧民的賑濟政策則採行統制的方案，透過官方力量以控制地方以免發生進一步的搶米風潮。因此，清朝政府的經濟政策，既不能視之為完全放任，或完全統制，政策實施的背後，是建立在全國普遍利益的考量之下，圖謀達成整體社會的安寧。岸本指出，上述的政策之中，並未見到清朝政府對某一階級的保護，毋寧是建立在「一君萬民」的普遍觀念之下。「因時、因地制宜」，「有治人無治法」才是傳統中國經濟政策的特質。國家基本上只是擔當著監督的角色。

### 三、內容評介

細讀岸本教授的大著，並抽離出書中論述的重要課題後，回過來再看書名《清代中國之物價與經濟變動》時，最初抱著以了解清代經濟史的先入為主心情，驟然間發現書中內容實包含著更為寬廣的視角，論述的範疇固然以經濟為軸心，但思考層面卻涵蓋整個清代的制度、社會、文化與思想，建構出「新史學」中所謂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向。文章的最後，希望把個人讀後所思所得，就教於作者。

(1)書中關於清代知識份子的消費觀念部份，以清初康熙年間魏世傑的〈奢客說〉與清末陶煦〈培本論〉為例，論述清代前後期士人對消費觀念的差異，但在這個差異之中，究竟這樣的消費觀念在清初至清末期間有何轉變，轉變的外在條件為何？文中並未提及，似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近年林麗月與陳國棟的論著中，也討論到明清間消費觀念的問題，但時代亦僅及於乾隆年間，其中所見的消費思想，也多沿襲著傳統的觀念與主張。<sup>2</sup>或許陶煦所提出刺激大眾消費主張的背後，仍是以地主主動減租為前提，但相較於以往傳統知識份子對消費角色的論述，其焦點幾乎只放在地主、富戶或商人的思考框架下，陶煦的消費思想則有其特殊性。假如陶煦的大眾消費論代表著清末的新觀念，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思想變化究竟如何？這樣的一個斷層似尚待填補。

(2)上述清代的消費思想討論中，富民角色一再被強調。由於清代市場性格包含著不安定的矛盾特質，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富民一面被強調為「一室之富，可為百室之養」或「貧富不謀而相資」（見唐甄，《潛書》下篇上，「富民」），另一面又被貶斥為「為富不仁」，成為地方民眾抗租搶米的對象。「富民擁護論」與「反富民論」這樣的矛盾主張，究竟該如何進一步釐清？當大陸史學界投注心力從事對傳統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研究時，被視

<sup>2</sup> 林麗月，〈陸楫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新史學》，卷5，期1（1994年3月）；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卷5，期2（1994年6月）。

為「資產階級」或「剝削階級」的富民，其「經濟史」的研究上仍待深思。

(3)關於田價的資料問題。作者對晚明田價的起伏變化在各章中互有出入，如第四章中指出萬曆至崇禎年間江南田價上漲（頁 154）；第六章引用的數據資料與文字資料又互異，雖然作者文中曾對此有所解釋，認為大致呈上漲趨勢，但從頁 218 圖 6.1 所見，田價的分佈仍屬零散數據較多，尚難清楚指出其動向。至於清初康熙十九年米價回升，而此時田價隨之上漲，但二十年米價持續上升之際，何以田價又告回跌？或許康熙二十年米糧豐收帶動田價下跌，但只能解釋短時的季節性變動，而往後直至乾隆初年為止，江南田價何以仍處於低水平？似乎季節性波動因素仍不能解釋此一變化。又，文中第十二章指出同光年間米價下跌，但據書中引用趙岡有關江南水田價格變動資料卻顯示此時上漲的局面，上述兩種米價與田價的相關變化作者並未加以任何解釋。

(4)關於海外貿易白銀的流通問題。首先有關晚明白銀的輸入問題，據林滿紅指出晚明經由菲律賓等地流入的美洲白銀，僅佔中國白銀流入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則佔三分之二，<sup>3</sup>但文中圖 5.10 却顯示兩者流入數量相當。另外，作者認為 1780 年以後中西方貿易總額雖有大幅度擴張，而白銀更因中西方貿易輸出入總額相近而輸入減少，但據莊國土的最近研究指出，十八世紀後期中西方貿易總額擴大，固然使白銀在貿易額中所佔比例減少，但在輸入的絕對量上仍有所增加（參見表二）。顯示十八世紀後期白銀輸入數量並非如書中圖 5.10 所示為減少。

<sup>3</sup> 林滿紅，〈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新史學》，卷 1，期 4（1990 年 12 月），頁 146-147。

表二 十八世紀白銀輸入中國數量

單位：兩

時 間	總輸入額	年平均額
1700-1753	1,900餘萬	36萬
1754-1759	130餘萬	22萬
1760-1770	820餘萬	82萬
1771-1794	1,200餘萬	50萬
1795-1799	370餘萬	74萬

資料來源：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鄭永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